

“福”: 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

□卢美松



主题·福地

伦理次序和行为规范。

先民以为非如此不能表达对天地神祇和祖宗神灵的虔诚敬仰之情。祭祀是庄重的祷告方式,也是必要的仪式,由主祭官统一指挥,就班肃立,跪叩鞠躬,行礼如仪。众人的班次按爵秩尊卑、血缘亲疏排列,行礼依号令起兴进退;过程还伴有音乐舞蹈,鸣钟击鼓、敲击弹奏、祝颂吟唱,庄严而热烈,让人产生敬畏、思慕和缅怀之心。

古人云:“礼别尊卑,乐殊贵贱。”庙堂之上、宗祠之中,最讲究的就是尊卑、贵贱,因为上古是血亲社会,王室按同一血缘的亲疏远近任官赐爵。礼乐是祈福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礼乐制度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标志。礼仪制度肇端于上古的祭祀活动,风行于庙堂之上市井之间,所以历史悠久;其内容虽已由繁趋简,又有雅俗之别,但其形式或程序至今相沿不替,留存于世风民俗之中。

中华文明的两大基本标志是文字和礼制,都源于上古初民时代的祭祀祈福活动,充分证明中华福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直接肇造中华原始文明,又对其后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更重要的是,文字和礼乐的创制和传播离不开当时的“知识分子”,因此祭祀祈福活动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群体。上古最初的知识人士,其实就是巫、史、卜、祝等一班围绕祭祀祈福活动而存在的“识字”“知礼”的文化人。其后的古典文献、诸子学说正是借助他们的记录,通过文字表述而流播的。

所谓儒家,正是从巫、史身份脱胎而出,成为专司整理诠释和传播古代坟典文献的群体。商周以后,中华文明的迅速发展及广泛传播,颇赖儒家与诸子学者的精心撰著与热情教化。由此产生了上古时代的中华文化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乐,这些典籍传承几千年,长盛不衰,构成中华文化的主

脉和基础。自古及今后学者对其进行无数的诠释和解读,所著书籍汗牛充栋,即此可知它们在中华文化史上的权威地位。

随着祈福活动的频繁进行,内容不断增加,要求逐步提高,文人自身也在充实知识、传承业务、扩大队伍,在世代传承中,人数不断增加,形成数量可观

身在福中

□林朝晖

畏,我急忙低下头,不敢再出声。

不过,父亲也将对子女浓浓的爱,融入到他对“有口福”的淳朴理解中。城中心的西餐厅开业时,我嘴馋得不行,缠着父亲带我过去过瘾。父亲经不起软磨硬缠,终于答应我的要求。去西餐厅吃饭那天,我穿上新衣,跟过节日似的。父亲看着我大快朵颐地饱餐,自己却少动筷子,只笑嘻嘻地说:“孩子,你是身在福中哟!”

父亲多次调动工作,我们全家也跟随他的脚步搬家。在莆田时,一家四口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厨房离屋子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打水、洗菜、

洗衣服,都要靠公用自来水龙头。日子虽然过得清贫艰苦,但其乐融融。回到福州,全家人又挤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住房条件和之前相比大有改善,父亲很知足。再后来,我们又从3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搬到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搬家那天,全家兴高采烈,父亲喜形于色,喃喃自语道:“住上了这么舒适的房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等到我工作,搬进装修好的新家,请父亲来参观时,他连连发出感叹,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孩子,身在福中要知福!”

身在福中——从年少到成年,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这句

话的含义。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福是物质生活的点滴改善与提升,福是努力工作之后的成就感与满足感,福是家人在一起的和睦与温馨……时代在前进,人们也实现着对幸福追求的一个个小愿望,收获着一个个小确幸,迈入美好生活,收获满满的“福”。

放眼有福之州,更是如此。一座座旧城新生,一条条大道如虹,一个个公园如画,一所所学校建起,百姓的日子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黑灰“的确良”到时尚个性的服饰,从果腹到舌尖上的享受,从难得出远门到说走就

衣食是福

□郑雯斌

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褶子表达出来。祖父自然不懂《诗经》中“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描绘的那种丰收喜悦的雅致。但在年成时,我真实感受到祖父麻利动作下那颗激烈跳动的心,因为所有的等待都有了回应,有了实实在在的回应。这是生命的福报和延续。

或许是在幼年时就与地和粮揉在一起,一直以来,我都感觉粮食不简单地只是粮食,它们是鲜活的。从在人的手中孕育,一路生长到结出果实滋养了人的生命,它们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在田里劳作时,我经常可以感受到粮食的生命韵律,比如割稻的时候,一颗颗鼓囊囊的谷粒,藏在一穗结实的稻穗里面,剥开来看,谷粒还带着一点青湿和潮气。凝目良久,仿佛可以看到它们的一生——它们是如何在暗夜紧紧挨在一起相互扶持的,它们在细雨中聆听骨节生长时所发出的声音,在阳光灿烂的时候随风舞蹈……

有地就有粮,有粮就有了福。这与《说文解字》中对“福”最初的释义——“福”同“腹”,即吃饱肚子、吃饱是福是

相符的。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彼时已是仓廪丰盈、衣食富足。我的记忆里,储存着许多粮食的味道,那是幸福的味道。

童年时,一个大家庭用一方土灶一口大铁锅做饭。天蒙蒙亮,米香顺着门缝缝爬上床,把我们唤醒。母亲用笊篱将半熟的米饭捞进饭甑,炊成干饭。余下的米汤抓一把糟菜扔进去,再撒几颗粗盐,就成了下饭的糟菜米汤。不忙的时节,母亲也会搓上几个饭团,内里裹着几个黄豆大的老红糖,软糯香甜通过舌尖一直穿到内心深处……

每年水稻收成双抢时,晌午过后,母亲会担着稀粥来到田里。这粥是母亲一大早就煮好了的,放入水井里凉了一个上午,是再好不过的解暑佳品。稀粥就着黄竹笋干,“呼噜呼噜”一口气好几碗便倒进肚里。有时,母亲会加些鱼腥草或是淡竹叶之类的中草药,喝了能防暑解渴,驱散了不少刈稻的辛苦。

饭与粥只是糯米作为食物最简单的呈现方式,母亲总是能把各种各样的粮食,做出令人感到温暖与幸福的味道。不止我的母亲如此,村里的每一位

的群体。有观点认为,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就是后世儒者的先驱。汉许慎《说文解字》称:“儒,柔也,术士之称。”唐颜师古曰“凡有道术者皆称儒”,正如今之所谓“学者”。因为上古占卜过程和对占卜结果的诠释包含了广泛的内容,涉及诸多领域,由此而造就具有各方面知识的专门人才。诸子也者,就是分为诸多门类的学者先生。

随着时代推移、社会进步,层累地积聚起来的知识,分野而成多种学科与门类的专业文化知识。由此可知,经过夏、商、周三代1000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分蘖,其丰富与深刻程度可以想见。因此到春秋战国时期,自由的思想研究与知识传播,开明的学术交流与学派争锋,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爆发的高潮,诸子立说、百家争鸣,各逞其辩才与学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以前长期的学问积累和人才储备,没有旧有专制制度的解体和常态传播、自由争鸣的社会文明条件,是很难出现文化昌明的盛世的。福文化在其肇始阶段因为促成了众多学术群体的形成,如儒、墨、道、法、兵、农、名、医、杂、纵横、小说等上百种学术门类,中华文化因此空前繁荣。诸子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为中华文明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对福祉的追求几乎关涉所有人群,福文化泛化而为不分时空的存在,如同阳光、空气一样,随处可见,为人所需。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创造,普及于世界,嘉惠于大众。由上可见,中华文化是祭祀祈福发其端,更由世代相传的福文化活动延其绪,进而有文字的出现、礼乐礼仪制度的产生,更进一步则有作为知识载体和文化传播者的出现。这一系列文明事象与文化形态的存在,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延绵不绝的文明传统,并且随时代发展而日见创新与壮大。

走的旅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何为福?我想,身在有福之州,是最能够体会到福之含义的了。每逢周末,到福州各处走走看看,游走在“闽江之心”,只见光影迷幻,传统古韵与时尚月光在这里交汇融合;徜徉在上下杭,月光和灯火缠绵,水雾和灯火光影绰绰;行走在三坊七巷,那里的白墙灰瓦,如耳语般低低倾诉着千年间悲欢离合的过往……真正让人感觉到,福州是一块福地。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幢又一幢古色古香的住宅,都蕴藏着一个个温暖的“福”字。

在这块福气宝地上行走,总会觉得特别的舒心与温暖。走累了,去温泉池通身一泡,舒筋活血,彻头彻脚红通通,十分幸福和舒爽。从温泉浴中出来,再来小吃店,要一碗福州特产鱼丸拌面,听一曲旋律优美的《有福之州》,遥望远方的福道在山上盘旋,小灯笼似的福福高高挂在树枝上。那一刻,脑海忽然闪出父亲的影子,他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孩子,身在福中要知福哟!”

一段书香可致福

□陈常飞

闽地自古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声誉,历代俊贤辈出,皆以实践儒家“福德观”为要旨,传统经世致用之学术传统。许多世家大族无不重视家风传承,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强调诗书传家,以求福荫后代。

福州是闽省藏书重镇,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的历史名扬久远。藏书事业不同于一般文化,它不仅是一个“专业”、一种文化现象或一段小众历史,它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历代士人通过藏书以饱览经卷,提升境界,此读书过程即为增福之本。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中写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有工夫读书,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福;无是非到耳,谓之福;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这是关于读书是福的经典论述。历代许多文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发出读书是福的言论。如福州文人林宾日有联句云:“清茶淡饭布衣裳,那些福老夫享了。”文人清闲时多与书籍为伴,故知其中也潜藏着有闲读书是福的理论。近现代海军将领陈季良笔下的题花厅联也直白地写出有闲读书为福:“竹里静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清代著名学者梁章钜,有“一代福人”之称。清王叔兰贺梁章钜七十寿联云:“二十举乡,三十登第……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梁章钜喜读书、勤著述、好藏书,一生共著诗文近70种,藏书多达10余万卷。陈寿祺是经学大师,林则徐更是将他藏书楼比作“琅嬛福地”,有诗云:“入室崔嵬五万编,琅嬛福地地行仙。”(林则徐《云左山房诗抄》卷二)而龚易图大通楼、乌石山房藏书更是号称当年闽省之最,直与清末江南“陋室楼”“铁琴铜剑楼”“八千卷嘉惠堂”媲美。龚易图将藏书作为传家之福,交代说:“舍此他无术可嗜,贫儿骤富便成痴。”将藏书事业看作比侯封拜还更重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存大爱,肯将自家藏书面向社会开放,在其环碧轩大通楼上,曾有一联云:“藏书岂为儿孙计,有志都教馆阁登。”在图书馆事业未发达以前,此举为造福社会的举措。20世纪50年代,龚氏家族代表还将“大通楼”藏书15000余卷、4000余册捐赠给福建省图书馆,以福惠更多读书人。

福建自古文风兴盛,此文教之福多赖于藏书事业。由宋迄清,我省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还有:莆田方氏藏书楼、吴与书室、郑樵夹溪草堂、陈第世善堂、谢肇淛小草斋,等等。古代学人认为拥有藏书才是读书人完满的生命状态,正如清人张金吾所说:“藏书者,诵读之资,学问之本也。”据相关统计,仅宋代福建藏书家就有107人,明清两代更是书楼林立,藏书家辈出。

藏书事业生动诠释了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为读书而藏书,是学人共同理想,也是这批群体的养福之资、致福之路、造福之进阶。他们潜心书事,在藏书、读书的过程中乐享清福,同时通过读书以求经世致用,为社会谋求福祉。



生都在追求的生活极致。



六岁时,我便被母亲领着去看地,地就在小村的河岸边。她说,这个世界很大,人很多,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地,我能有一片地是我的福。那意思我清楚,是小时候跟着她一起下地干活了。村人遇到母亲也会说:“娃能下地了,您就要享福咯。”

在吃食都源于地的村,有地便是有福。一道道长短不一的田埂将地阻隔,仿佛一条条涌动的血脉,交错延伸,连接着粮食、劳作和希冀。我走在田埂上,望着那小块小块装着水的地,当时秋天,地里不仅装着水还装着正在逐渐转黄的水稻,看上去浩浩荡荡,金灿灿的,那是我们全家人播下的希望,也是大半